**新冷战时代之中美关系**

第七届南南论坛2020年7月10日（香港时间8.30pm-11pm）

**论坛前交流第一回合**

**问题**

1. 萨米尔·阿明谈到了资本主义的內爆。关于资本主义的崩溃看起来有过太多的“预言”，然而灾难资本主义似乎还在加剧两极分化、让边缘人口遭受苦难和淘汰的基础上继续。您是否认为当前疫情大爆发、经济衰退和气候变化导致接下来情况的演变以及人民的反应，是全球、区域和国家秩序的转折点？会以什么方式发生？
2. 您认为中美新冷战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在当前的历史形势下，您觉得它对两国乃至全球会有什么影响？
3. 对这些问题有许多批判性的分析，但您怎么看不少不起作用所谓的“另类选择”，您觉得应该在全球、区域、国家或地方各级如何寻求另类选择，例如在金融、经济、去殖民化、去增长、去核化、再本地化等等方面？
4. 您对于另类的理论、实践、政策、策略的主张的要点是什么？
5. 您对本群组其他成员的分析或建议有何意见？是否同意？为什么？

**Michael Hudson迈克尔·赫德森 (2020-06-15)**

新冠病毒只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的催化剂而已。当时间来到2020年时，美国经济已进入奥巴马大萧条12年。我之所以使用这个词，是因为他在2008年（甚至在2009年上任之前）做出了一个决定，导致后患无穷，即不把垃圾抵押贷款债务（主要是欺诈性债务）转回，以回到支持现实的房价和债务人的支付能力。相反，他将债务记在账上，允许甚至鼓励银行取消1000万美国家庭（主要是少数族裔）的赎回权，并将止赎房产的所有权转让给非自主的华尔街业主以供出租。奥巴马也拒绝起诉银行家。相反，他通过4.6万亿美元的量化宽松政策和美联储的大规模支持来拯救金融市场。

因此，2008-2020年的GDP增长仅仅只涉及到美国人口的5%。剩下的95%都缩水了。经济两极分化，因为上层阶级的财富是由房地产食利阶级以牺牲劳动和工业为代价获得的。我在我的书《杀死主人》中描述了这种发展变化。

这是资本主义吗？这并不是马克思所描述的工业资本主义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雇主们通过雇佣有工资的劳动力以加价出售商品来赚取利润。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经济已从工业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转变。马克思确实描述了这种发展变化。

也就是说，美国霸权的驱动力又增加了一个明显的层面。它不仅支持金融资本主义，而且支持垄断资本主义——想把所有的垄断权集中在美国手里，而且阻碍外国发展和自给自足，包括从粮食到石油和能源、信息技术和通信，再到原子能。从第三世界国家的粮食生产者到IT创新者，美国都在行使霸权，伤害任何潜在的竞争对手。

美国外交正迫使其他国家在美国和非美国的能源、信息技术、食品和其他基本必需品供应商之间做出选择。最重要的是，对美元化的美国金融体系，包括SWIFT（来自美国的欧盟殖民地）。在这一点上，有效的做法是统一世界其他地区，使自己免受美国制裁扰乱他们生产过程的威胁。金融主权的关键是要摆脱美国银行业和SWIFT系统。

对此，美国的反应是秘密暗杀和公开军事威胁相结合。

如何推动另类的全球化道路？首先，现有的债务管理费用需要被减记：一笔勾销。从以外币计价的政府债务，以及没有合理计算支付能力的“垃圾贷款”开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贷款、美国对外援助贷款。

这将不包括抵押贷款债务，因为这对非自住业主是一个免费的午餐，他们通过赊购房产获取资本收益。无论如何，取消债务需要遵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税收政策。

需要制定一项基本法：如果债权人向债务人提供贷款或提出财务索赔，而债务人没有合理的支付可能性——不没收财产或在经济胁迫下出售资产——则该贷款被视为欺诈性贷款，并应该被撤销。

传统的税收主要是针对经济租金收受人（1%到10%）。它是基于古典经济学的价值、价格和租金理论，作为对经济租金征税的基础——土地租金、垄断租金和资产价格（“资本”）收益。从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到李嘉图、约翰·斯图尔特·密尔、马克思、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西蒙·帕滕，再到托尔斯坦·凡勃伦，这就是19世纪漫长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讲述的一切。

为了评估经济增长和进步，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模式，首先是将FIRE部门（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隔离出来，还需要衡量“经济的负外部性”，如全球变暖、犯罪、流行病和疾病等的清除成本。

**Radhika Desai (2020-06-16)**

在我看来，萨米尔·阿明认为资本主义正在內爆是因为他明白资本主义正在积累矛盾。他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他从历史的角度思考资本主义，而不是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式，后者也有马克思主义的版本。

我认为他这样做是正确的，我自己的工作也是从历史的角度考虑资本主义。在整个新自由主义的40年里，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人们甚至可以从更长远的视角来考虑。

自十九世纪末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那些与国家紧密结合的大型垄断公司主导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那时起，国家就越来越成为资本主义的中心，包括在国内政策方面，国家越来越多地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提供市场，无论是通过直接采购还是通过福利国家及相关的高就业政策创造高需求；在国际上，则是通过帝国主义政策。这种逻辑最终导致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资本主义秩序的三十年危机（1914-1945）中达到了顶点。此后，由于苏维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的胜利，由于一些资本主义大国的失败而暂时缓和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可以通过在国内仿效社会主义政策，在国外接受非殖民化而进一步发展。

这种凯恩斯主义-福利主义战略是建立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政治妥协基础上的，当这些对立的利益无法再调和时（主要是因为生产率的提高使其有可能放缓），在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中，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发生了公开战争。问题是，是否遵循历史逻辑，为了人民的利益深化资本主义的社会治理，实质上向社会主义靠拢，还是在社会妥协上倒退，维护资本阶级的利益。

以下是一些不同的选择：第一种是可行的和可持续的，第二种不是。因此，当采取第二种选择时，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就走上了一条矛盾加剧的道路。大致顺序是：

1. 新自由主义战略不能恢复资本主义生产。相反，通过降低国内工资增长率和它可以控制的海外经济体的工资增长率，它限制了世界需求，尽管从技术上讲，增加生产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
2. 在需求有限的情况下，国内生产性投资受到限制，虽然在国外有一定的扩张空间，但也有限。
3. 从移民和第三世界劳动力中受益或依靠降低成本的低投资部门扩大了生产，这也意味着第三世界的低工资和低价格，无论是初级商品还是轻工业生产。
4. 这也意味着，鉴于这种资本主义的资源足迹越来越大，对环境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5. 替代（温和的）通货膨胀的灵丹妙药，这导致了影响世界经济的通货紧缩的死角。
6. 因此，越来越多的资金进入金融部门，在生产基础按比例缩小的情况下寻求回报。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它们能够获得高利率的回报，但到了21世纪初，同样的高杠杆金融机构自身则需要低利率的支撑。
7.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不包括日本）的增长依赖于资产泡沫及其财富效应，这可能扩大不断缩小的社会阶层的消费。
8. 这些资产泡沫最初发生在西方以外（记得东亚金融危机），但随着越来越多能够维持其资产泡沫的国家保护自己不受其影响，它们开始发生在西方：20世纪90年代的股市泡沫和21世纪的抵押贷款泡沫就是最好的例子。
9. 这种食租类型的资本主义需要越来越多的国际监管，因为它越来越得不到人们的认同。
10. 在2008年最后一次爆发后，西方资本主义的选择范围缩小了。贸易增长加速放缓，国际资本流动从未恢复，资本主义战争造成移民危机，气候变化加速，现在，这场新冠病毒——它本身就是入侵越来越多野生动物栖息地和从事工厂化农业的突破“底线”压力的结果——已经大爆发。

我相信上面的提纲只不过是一点启示而已。然而，这使我们更容易理解萨米尔所说的资本主义内爆是什么意思。它正在发生。这对那些认识到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尽管中国有许多资本家）的人来说最有意义。

美中新冷战的特点，要通过不平衡的发展和联合发展的逻辑来理解。资本主义是矛盾的，帝国主义也是矛盾的。帝国主义是使弱国屈从于资本主义矛盾的后果的一种手段：它的商品和资本过剩，它需要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因此，资本主义在世界某些地区的发展，使弱国在服从和抵抗之间作出选择。许多人别无选择只能屈从，但是，那些可以通过追求独立工业化来抵制的国家，托洛茨基提出一个更好的词，叫做“联合发展”。他指的是国家支持的快速工业化发展。从19世纪末开始，德国、美国和日本对英国就是这么做的。俄国革命之后，又增加了中国这个非资本主义的案例。第三世界工业化（有限）的成功也形成了这样的联合发展。

因此，世界资本主义的故事既不是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创造了一个无缝统一的世界经济，也不是一连串“霸权主义”的故事。相反，它是资本主义强国通过自身与弱国的互补关系来维持资本主义的不平衡，与那些能够通过联合发展来抵抗资本主义的国家之间的对抗，后者旨在建立与强国相似的关系。在这场对抗中，后一方有其自身的历史，并导致了多元化的扩张，随着非资本主义形式的联合发展的出现，乌戈·查韦斯称之为多元化。

人们可以把最近中美紧张局势的升级称为新冷战，或者也可以看作是某种类型的战争，冷战、热战还是温和战，其实强国与竞争国之间始终存在某种战争。长期的结果可能是多极化的更广泛的传播。真正的问题是短期的结果会是什么，其中可能包括战争。

有一点我们可以说：除非华盛顿发生“政权更迭”，否则不太可能有谈判结果。

在新老冷战对峙继续进行的同时，超越新自由主义核心的世界必须继续制定和执行适合有关国家的政策。在社会、经济、政治和生态方面，所有可行政策的关键是资本管制。没有它们，就没有办法管理经济。资本管制并不意味着自给自足，只意味着一国与另一国之间的关系由合法当局而不是私人权力管理。资本管制需要尊重主权，这使得许多国际问题更容易解决，包括去殖民化和无核化。

一旦这些措施到位，其余的都是可能的，尽管这一点也不能保证。

银行事业的公共化是第二个关键步骤：它允许政府确保投机不会取代生产性投资。一旦这样做了，生产必要的东西和停止不必要的事情，将是第一要务。必须以生态上可持续的方式进行。这需要计划。去发展不是解决办法：减少资源足迹才是。

**温铁军 (2020-06-22)**

在我看来，萨米尔·阿明关于资本主义内爆的观点是一个客观规律，这很重要。在19世纪，资本主义还处于产业资本阶段的时候，因为产业资本的在地化以致资本家和工人都是有祖国的，国家之间的竞争最终演变成了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萨米尔·阿明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更多的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在新世纪之交开始进入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

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竞争，意味着资本主义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跨国公司使用没有国界限制的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寻找资源和劳动力价格洼地，将产业链配置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以期获得最大的利润。资本主义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全球不可移动的生产要素包括资源、劳动力等等最终都将被资本化。马克思当年讲过，当资本把人类完成了从人到劳动力要素的异化之后，资本主义就走向灭亡。

美国金融资本全球化，特别是科技资本化和金融资本直接结合的过程中，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造成严重的社会撕裂，这个内部张力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内爆。即使美国想通过再工业化来缓解自身的两极分化，受制于美元金融资本的利益阻碍，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违反金融资本主义客观规律的。针对这个阶段所形成的各种矛盾，所以我先得强调萨米尔·阿明的观点是一个客观规律的表述，而不是一般意义的主观判断。

此次的新冠疫情爆发，对于已经形成严重张力和两极分化的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意味着什么呢？我以前讲过疫情爆发将破坏全球化的供应链，因供应链的破坏而导致全球一体化的产业链的断裂，最终导致全球化的解体。在全球化解体之后，疫情会是资本主义内爆的扳机。疫情使得阶级斗争显化，比如美国黑人的街头暴动。扣动扳机导致的是这样的一个反抗，最终还是要归结为贫富两极分化，是一种阶级矛盾在新时代的异化的表达。

要想说清楚新冷战，先得将冷战这个概念做点解读。老冷战时候的“一个世界两个体系”，那在客观上是成立的。这个是和新冷战最大的不同，新冷战是“一个世界一个体系”。因为中国已经纳入到全球化了，在中国创造大量GDP的，形成大量产能的恰恰是西方的产业资本；中国所创造的大量外汇盈余是美元，大部分回流到美国的资本市场。与老冷战相比，苏联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控制着世界上一大批叫做社会主义的国家，他的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是两个体系。

老冷战也早就被毛泽东批评过了，他认为美苏其实是两个超级大国，并且认为美国是西方的老牌帝国主义体系，苏联是新的社会帝国主义体系。毛泽东提出所谓的“三个世界”理论，有点像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沃勒斯坦说的半核心，就是毛泽东说的第二世界，那些被叫做发达国家的这些国家，不是超级大国，属于被控制的、它既有顺从又得反抗，它有合作也有不合作，所谓的“两个体系”本身已经被毛泽东解剖过了。

因为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个垮了，接着进入到后冷战时代。面对苏东解体后留下的大量的破产的实体资产，西方金融资本得到大肆扩张的机会。与此同时，中国则进入到最艰难的时期，中国崩溃论此起彼伏。在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中国受到西方的一致制裁，外资全部撤离，中国被迫利用国家资本和政治主权赋权的本国货币来扩张经济，并且因为对国际金融资本的管制在1998年的东亚金融风暴中幸免于难。

这一阶段美国在全球扩张金融化，中国则在本国扩张货币化和资本化。这使得美国的金融资本明白，真正的威胁是中国。从那个时候西方开始把中国列为邪恶国家，准备拿中国开刀的新冷战其实就开始了。中国崩溃论变成了中国威胁论。于是我们把新冷战不是放在2020年，也不是放在2017年特朗普上台，而是放在1999年，是因为98年中国成功的应对了东亚金融风暴，并且是坚持着国家金融主权的条件下，使得西方金融资本在中国长城面前碰壁。

由于中国过去三十多年全盘西化，其实就是全盘照搬美国，学习美国的制度文化和社会科学，导致中国现在没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当美国对中国发起新冷战的时候，那套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软实力，中国几乎无以应对。中国自身没有任何在冷战时期应对老冷战意识形态和应对老冷战的策略，没有经验。因为在老冷战阶段中国不是主要矛盾，他恰恰是两大阵营两个超级大国都试图要争取的一个中间力量，双方都不想把中国作为主要对立面。

全球化解体之后很可能出现的是全球产业的重组，变成全球区域化，或者叫做区域一体化。中国已经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战略方向调整，那就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兼顾国内国外两个循环。中国现在已经具有相对比较完整的产业结构，跟美国的产业空心化很不一样。另一方面中国幅员辽阔，空间广大，仍然还有在国内进行亚区域整合的条件，比如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成渝经济区等等。

其次，中国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还有新基建。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更多的使用互联网技术，用互联网创业，工业4.0，人工智能，大数据，这套新技术的引领，在中国完成北斗卫星和5G体系，新基建仍然可以带动引领性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

中国内部大循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乡村振兴，发展绿色经济。中国农村的集体资源还有很大的整合空间，可以利用“绿色债券”来对应增发货币，形成自主的国有金融体系，就可以在即使面对美国主导的SWIFT体系的金融制裁，中国仍然可以维持一个超大型的经济体内部的金融化和债券化过程，在向金融资本升级的这个时段上还有空间。

关于迈克尔·赫德森提到的对资本利得征税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但是可能还需要再注意一下，现在跨国公司很多都不在美国注册，而是在那些非税国家或者低税国家注册，所以如果对这些跨国公司征税呢，它们就跑了。这一点在欧洲也是类似的，西方国家目前它的自由主义体制已经很难再约束这些跨国公司。这个思路是对的，但是操作起来有难度。